

演唱会不能只

不妨借鉴航空、铁路、旅游业等行业的退改票方案，推出可退改门票。同时，通过完善实名制、阶梯式退改制度，充分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推动演出票务交易公开透明。至于观众投诉较多的“柱子票”，现在VR全景等技术早就可以实现“选座自由”，就看平台有没有诚意去解决。

如今，跨城观演成消费热点，歌迷追求的不仅是看演出，更是吃住行游购全方位消费体验。从这个角度看，演唱会举办地既要引客，更要留客。比如，出台系列举措，从酒店服务、交通保障、市场监管、安保举措等多方面为观众服务。相关行业协会也可以发挥作用，自觉控价，不随意涨价。但稀缺并不是拒绝退票的理由。观众消费热情要精心呵护，只有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消费体验，才能促进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演唱会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社会效益账。监管部门要引导平台和企业合作好商业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随着歌迷逐渐成熟理性，会对演唱会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歌手、音响、灯光、舞美、售后，每个环节都要与价格不菲的演唱会门票相匹配。演出公司不能只管搭台卖票，更要加强对演出质量和观众体验的把关。演唱会品质高了，观众体验感好了，自然就会觉得“值回票价”。

票务平台要承担起相应责任，确保观众权益得到保障。稀缺性、时效性并非演出行业独有特性，在航空、铁路、旅游业都具有类似特性的行



白水平摄 (中经视觉)

文体市场面面观

今年以来，线下演唱会迎来强劲复苏。门票秒光，赞助商大赚，平台“赢麻了”，还拉动举办地文旅消费层创新高。在收获高人气的时候，演唱会也遭到了不少消费者吐槽。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热点问题中，演出票务问题尤为突出。价格不菲的演唱会能否值回票价，引发广泛关注。

有消费者提到，网购演出票就像拆盲盒，一些位于视觉盲区的“柱子票”“墙根票”让观众全程“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此外，退票难也成为消费领域痛点。平台往往以演唱会门票具有稀缺性、时效性等特点为由，拒绝退票要求。凡此种种，说明演唱会票务服务与大众期待还有一定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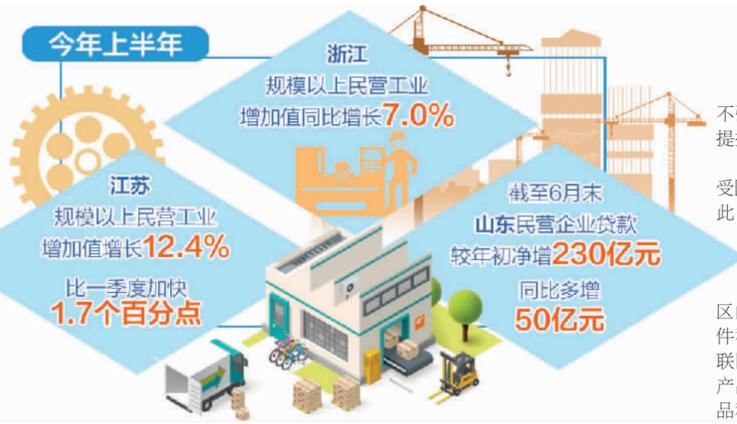
不可否认，受场地、明星档期等条件限制，演唱会具有一定稀缺性。但稀缺并不是拒绝退票的理由。观众消费热情要精心呵护，只有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消费体验，才能促进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演唱会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社会效益账。监管部门要引导平台和企业合作好商业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随着歌迷逐渐成熟理性，会对演唱会质量提出更高要求。歌手、音响、灯光、舞美、售后，每个环节都要与价格不菲的演唱会门票相匹配。演出公司不能只管搭台卖票，更要加强对演出质量和观众体验的把关。演唱会品质高了，观众体验感好了，自然就会觉得“值回票价”。

票务平台要承担起相应责任，确保观众权益得到保障。稀缺性、时效性并非演出行业独有特性，在航空、铁路、旅游业都具有类似特性的行

多地加速释放民营经济发展动能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重大部署，明确了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以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路径。多地近期密集推出系列政策举措，聚焦企业发展具体问题，推出精准有力措施，加速释放民营企业发展动能。



激发民企动力活力

8月8日，在山东省德州市武城经济开发区的航技风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台台风机即将连夜发往新疆。公司董事长周峰说，获得这批订单主要得益于经开区的牵线搭桥。武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侯志刚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当地建立专班服务机制，对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产业的纳税前20名民营企业重点培育、动态管理。

普惠贷款风险补偿率额度提高至10亿元，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建立“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企业服务工作机制……近日印发的《广州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从扶持政策、服务体系、法治环境等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稳预期、强信心。

行政权力的“减法”，换来市场活力的“加法”。“减办事流程、减审批环节，归根结底减的是政府权力、部门利益。”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表示。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正大力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强。上半年，浙江新增民营经济主体同比增长12.2%，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2.3个百分点。

聚焦发展难点痛点

“当前，江苏民营经济存在着技术创新难、人才引进难、产业链和供应链协同发展欠缺，以及中小型企业融资难、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等痛点、难点和堵点。”江苏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蒋昭乙表示。

融资难、融资贵也是民营企业的“心头之痛”。截至6月末，山东民营企业贷款较年初净增230亿元，余额超过2300亿元，同比多增50亿元，余额、增量居山东省内四行“双第一”。

民营企业是创新发展的主力军。广州“民营经济20条”提出，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多个领域加大应用场景开放力度，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应用场景设计与建设。特别是针对“企业由于创新出现的首次不合规”，制定行业性合规指引，探索在清单范围内，引导其在限定时间内整改完毕，依法不予处罚。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健全服务体系、优化发展环境，持续提升中小企业发展的‘含金量’。”山东临清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李光说。当前，山东省民营经济还存在龙头企业偏少、创新活力不足、产业结构偏传统重化工业等问题。山东省工信厅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处负责人栾永强表示，将引导和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瞄准产业前沿、细分领域、市场需求，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进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在各项惠企政策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江苏规模以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7个百分点，为江苏经济稳中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应进一步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区域之间的壁垒，在提供普惠性金融、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更加公平公正的待遇，更好地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蒋昭乙建议。

提振信心改善预期

当前，一些民营企业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预期和信心亟待提振。

厨具是浙江嵊州传统支柱产业，但受困于需求疲软，行业发展遭遇瓶颈。为此，嵊州出台数字化改造实施方案，助力民营制造企业尽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替用户买菜、定制菜谱、一键烹饪……位于浙江嵊州经济开发区的一家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一件件科技产品让人大开眼界。“我们将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应用到集成灶等厨房产品中，构建数字化消费场景，实现产品和服务迭代升级。”该公司负责人说，通过数字化标准化建设，产品质量水平不断提升，企业发展更具韧性活力。

企业的诉求，就是政府努力的方向。“目前山东‘接诉即办’平台年均受理企业诉求7.6万余件，我们将优化企业诉求‘直通车’机制，确保每一个诉求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徐闻表示。

“强化民营经济平等保护同时，细化民营经济发展红线与底线，实现‘法无禁止即可为’。”浙江省委改革办负责人表示，浙江牢固树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将公平竞争作为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举措。“我们将点燃二次创业的奋斗激情。”作为一名深耕制造业超20年的民营企业家，广州海缝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晓欣表示，“民营经济20条”激发着广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企业将进一步加快数字化转型脚步，不断提升智能化制造能力。

文/本报记者 王金虎 张建军 柳文 薛海燕 蒋波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火把节开幕

本报成都8月11日讯(记者钟华林)2023年第八届凉山彝族自治州火把节暨夏季清凉凉山游系列活动10日在四川省西昌市火把广场开幕，这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时隔8年后重启。本届火把节以“清凉夏日燃情火把·领略彝风玩转凉山”为主题，开展包括开幕式暨火把之夜、彝族传统选美、广场舞展演、精品剧目展演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以西昌为主会场，覆盖全州全域，是历届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的一届火把节。

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上接第一版)

告别“花瓶”独董

独立性是独董最基本的任职要求。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独董任职条件和资格认定的监督管理存在短板，“花瓶”独董、“既不独也不懂”等现象备受诟病。

对此，《办法》从任职、持股、重大业务往来等方面，细化了独立性的判断标准，明确了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8种情形。同时，《办法》还改善了选任制度，从提名、资格审查、选举、持续管理、解聘等方面全链条优化独董选任机制，建立提名回避机制、独董资格认定制度等。

“独董制度迎来全面改革，全链条优化独董选任机制，能够相对改善独董选任质量。同时，原则上最多只能在3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并明确独董履职重点和特别职权等，有助于独董尽职尽责，扭转和改变‘花瓶’独董现象，让独董真正走向职业化、规范化。”田利辉说。

此外，《办法》还赋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建立独立董事信息库的职责。郑志刚认为，通过市场化方式建立独董信息库，可以保证独董有更独立的来源，让资本市场对独董有一个有一个历史判断和客观评价，从制度上规避过去主要由大股东提名而导致的“任人唯亲”等弊端。

由于独董外部身份的特殊性，使其无法参与公司治理的各环节。为尽可能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对独董履职造成的障碍，《办法》要求，上市公司应为独董履职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条件。比如，指定董事会办公室、董事会秘书等专门部门和专门人员，协助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等。

杨林表示，从长远来看，科学合理的独董制度，能够让独董发挥公司决策者、监督者、行业专家等多重身份作用，既在公司治理上奠定坚实基础，又能促进上市公司发展得更好、更强，广大投资者也将在企业发展中获益，

确保不打折出实效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独董超过1万人。随着《办法》实施，独董履职生态无疑将发生变化，这对独董职业吸引力有何影响？

“《办法》明确了独董的法律责任、厘清了独董的履职边界，真正有能力、有资格、有理想的独董会更加认同职业，为上市公司服务。”郑志刚认为，未来还需树立一种文化氛围，即独董以为优秀企业服务为荣，上市公司能以聘请到优秀独董为荣。让独董制度回归其初衷：上市公司花高薪聘请专业的、外部的、更加注重声誉的专业人士，来帮助投资者说不，形成一个自动纠错机制。

对于如何确保《办法》不打折、出实效，郑志刚认为，接下来，市场参与各方还要继续完善独董薪酬制度，只有足够合理的薪酬激励，才能使独董真正愿意承担风险，努力成为上市公司服务，做好上市公司“看门人”。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应在充分理解《办法》规则要求的前提下，结合自身运作经验，构建更加科学的独董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公司法人治理要求，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运作。”杨林表示，首先要落实要求、修订制度。尤其在一年过渡期内要认真领会《办法》改革的精神，逐一落实各项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对现有的《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修改更新等，确保《办法》在上市公司落地生根、发挥作用。上市公司要从组织、人员、资源、信息、经费等方面为独董履职提供必要条件。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指导证券交易所、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建立健全独立董事资格认定、信息库、履职评价等配套机制，加大培训力度，引导各类主体掌握改革新要求。同时，持续强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监管，督促和保障独立董事发挥应有作用。



美国加大对华国际金融竞争的全球危害

马雪

美国在金融方面具有一系列优势，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债券市场规模庞大、衍生品市场占据领先、垄断全球金融基础设施、主导国际主要金融机构、更是享有货币霸权，这意味着美国在国际金融博弈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近几年，美国对华从贸易战、技术战扩展至金融遏压，明显加大了对华国际金融竞争。

第一，聚焦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美国将中国发展替代支付系统视为规避美国金融制裁和美元体系的潜在挑战。美国国会发起《针对中国金融机构与俄罗斯金融机构支付、核算、结算交易制裁法案》，建议冻结或禁止为俄罗斯金融机构提供交易服务的中国金融机构相关的任何美国账户，禁止俄罗斯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进行任何交易。

第二，企图规制人民币发展空间。美国将中国数字人民币的兴起视为中国在金融领域弯道超车的捷径，明确称不能让中国获得数字人民币优势，不仅在七国集团框架下发布央行数字货币基本原则和核心特征，借此掌握未来央行数字货币规则涉及话语权，而且以“数字主权”“不注重隐私”“中国仍有严苛资本管制”等抵制数字人民币。美国国会发起的《对丝绸之路法案说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对数字人民币发出警告，要求美商务部长就数字人民币服务贸易的网络向相关国会委员会报告，并要求商务部长报告有关数字人民币的贸易执法行动，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报告数字人民币对贸易和投资协定的影响，要求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为转移、存储或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机构制定标准和指南，要求任

何通过外国军事融资计划获得援助的外国政府披露其是否使用数字人民币作为结算或储备货币。

第三，妄图消除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甚至欲在极端情况下将中国剔除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经济组织。美国国会发起的《2023年中国汇率透明度法案》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执行董事倡导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汇率安排的透明度和监督，《2023年中国货币责任法》将指示财政部长要求IMF的美国代表反对增加用于确定特别提款权(SDR)价值的人民币的权重。《2023年中国金融威胁缓解法案》要求财政部长在颁布后一年内研究并报告美国和国际经济对中国金融部门变化的金融风险敞口，指示财政部长与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国务院开展磋商以进行研究。《2021年特别提款权监督法案》还限制他国在IMF将本国SDR转换成人民币资产，以遏制人民币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这些反华法案未必都能通过，但其数量和审议速度均显示出美国将采取更多极端手段对华金融遏压的态势。

一方面，这是美国对华经济系统优势的需要。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优势在产业生态系统，中国增长的金融实力更被美国视为洪水猛兽。美国要利用金融优势构建新的经济生态系统，对华展开长期竞争。特别针对中国推广人民币等动摇美元体系的挑战进行竭力遏压，避免中国从产业系统优势上升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金融体系优势。

付平台等技术的兴起，加大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离心力。颠覆性新技术推动的数字人民币，威胁到美元的主导地位和美元霸权。数字货币和支付工具，提供了更快捷的支付手段，更多元化和投机性的投资组合途径。无论是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还是主权性质的央行数字货币，都以其便捷的跨境支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以美元为主导的支付体系。

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如果中国依托数字人民币构建大规模跨境支付体系且该体系成为银行间首选的转账系统，那么将削弱美元计价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份额，冲击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普遍应用。因此，美国加大对华国际金融竞争。上述态势不仅涉及中国对美金融利益，更关系中国全球影响力、国际声誉，影响中国未来金融发展的国际空间和外部环境。而两国金融摩擦的杀伤力将明显大于贸易摩擦，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将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中国而言，美国加大国际金融竞争，使得中国内外经济环境被扰乱的风险上升。美国遏压使中国遭遇超出传统金融范畴的战略挤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具挑战性。若要继续与美国主导的体系进行互动，将面临异常严苛的规则制度门槛，付出额外的经济代价。若要另起炉灶，难度则可能大于美国巩固体系、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处于非对称体系竞争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企业愈发难以通过美国主导的市场获得长期动力和资金支持，企业海外发展的成本和风险陡增。上述态势

也可能使得发达国家仅满足维持与中国贸易关系，而不愿加强与中国的金融和政治联系。

对美国而言，金融体系的调整也使其自身面临多重风险。与中国金融的割裂可能会影响美国金融机构资本的跨境配置、国际支付系统和资产价格。美国金融机构面临更大监管负担和更高运营成本，其在部分跨境经营中相对其他国家更为复杂。若欧洲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不采取类似措施，则美国金融机构将处于劣势，进而选择将部分业务和资产移出美国司法辖区，以避免被管制。从其国内看，美国银行的融资成本会增加，盈利能力将下降，且其向私人部门提供的信贷将减少。

对全球而言，金融割裂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加剧宏观金融波动。从长期看，随着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不断上升，国际金融体系长期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更好地反映新兴国家的经济分量。美国强行逆转这种趋势，就可能出现全球经济碎片化的灾难性情景，这些沟壑和裂痕使得各国相互贸易和投资时采取排他规则，不仅会抹杀科技传播的效益，也抹杀了各国的专业化。进一步的金融割裂还可能限制跨国分散风险，从而加剧资本流动和宏观金融波动。金融动荡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明显大于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金融市场压力的出现使新兴经济体央行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在当前通胀高企、金融环境趋紧的环境下，新兴经济体央行既需要化解金融风险，又需要实现价格稳定的目标，在风险承压期间可能面临复杂而艰难的权衡取舍，这可能带来更复杂的宏观金融稳定风险。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